

•184527

基
本
館
藏

必須忠誠老實

61
61
7643

上海人民出版社

目 錄

必須忠誠老實.....	“人民日報”社論(1)
革命幹部必須對組織忠誠老實.....	王 琪(6)
放下包袱，說老實話.....	馬鐵丁(13)
附：胡存新給“中國青年”編輯部的信	
忠誠老實，不講假話.....	楊 文(20)
提倡說真話，反對說假話.....	李景春(24)
為什麼要隱瞞？.....	史 彬(29)

必須忠誠老實

“人民日報”社論

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對待自己的國家和對待領導這個國家的共產黨，應該採取什麼態度呢？毫無疑問應該採取忠誠老實的態度。如果有人用說假話、扯謊的手段來欺騙國家、欺騙共產黨和其他革命組織，他就一定會受到羣衆的鄙視，因為人們都認為這種欺騙行為是有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為人的道德的。

作為共產黨員、青年團員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更應該用忠誠老實的態度對待黨、對待團、對待國家、對待一切革命的組織，否則他不僅會受到羣衆的鄙視，同時也將為黨組織、團組織和國家的紀律所不容。有這種惡劣行為而不改正的人是不配作為共產黨員、青年團員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包括國家行政機關、事業機關、企業機關、黨和羣衆團體的機關工作人員）的。

必須指出：現在還有一部分共產黨員、青年團員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有關自己的歷史政治問題上沒有說真話，而是說假話。有人隱瞞了家庭成分，有人隱瞞了社會關係，有人偽造了黨齡或團齡，有人隱瞞和偽造了自己的大部歷史以至全部歷史，有人甚至隱瞞了情節重大的背叛黨和國家的罪行。這

種隱瞞和僞造不僅嚴重地損害了共產主義的和新社會的道德品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情況很容易被反革命分子所利用。因為反革命分子為了“爭取人”和“聯絡人”，為了向黨和革命進攻，隨時隨地都在尋找我們的空子，要是在我們隊伍中，有人隱瞞了自己的歷史政治問題，欺騙了黨和國家，反革命分子是十分高興、十分歡迎、而且一定會盡量去加以利用的，這是十分明顯的道理。例如上海長寧中學有一個學生名叫楊士彬，他曾經是這個學校的一個反動小集團的成員，以後，他在學校教育和同學幫助下思想有了轉變，並因爲學習努力和工作積極而被吸收入團。但他在入團時隱瞞了曾參加反動小集團的問題，入團之後，他也知道自己欺騙組織的行爲是不對的，他也想交代，但始終缺乏交代的勇氣，後來他反而安慰自己：能隱瞞住就隱瞞住吧，反正這已經是歷史問題了。但是，反革命分子立即把楊士彬欺騙組織的事實作爲拉攏和利用楊士彬的把柄。楊士彬在反革命分子的威脅引誘之下，終於上了反革命分子的當，參加了反革命組織。一切隱瞞歷史政治問題而不作交代的人，還不該由此引起警惕嗎？

有人以爲在情節嚴重的政治問題上說假話不對，在情節不很嚴重的政治問題上隱瞞一點總不要緊吧。這種想法也是錯誤的和危險的。因為這裏的關鍵不是問題的大小和情節的輕重，而是對黨和國家的態度：是說真話，還是說假話？是忠誠老實，還是隱瞞欺騙？即使問題較小，情節較輕，如果黨一再號召對黨真實坦白，你却一再對黨欺騙和隱瞞，這就是一錯再錯，錯上加錯，就成了一貫不忠於黨和國家的人了。對這樣的

人，黨和國家是不能原諒的。曾經是北京市建築工程局器材供應公司工作人員的齊建民受到留黨察看兩年的處分，就可以說明這個問題。一九四二年齊建民參加了偽青年團，這個情形當時我們黨的基層組織是了解的；但齊建民參加了偽青年團之後，曾在日寇的暴力威脅之下，參加了一次搜捕抗日工作人員的行動。當時，齊建民只有十六歲。應該說，問題還不是十分嚴重的。如果齊建民在入黨前，或者入黨後經過黨的教育，認識了自己的錯誤，並且向黨徹底交代的話，黨是會從寬處理的。但是，齊建民不但入黨時未作交代，入黨後，歷經忠誠老實運動、“三反”運動和整黨運動，仍然未作交代，以後經當地檢舉，組織上再次指名要他坦白，他還是不作交代，並且企圖用最大的謊話來掩蓋他的欺騙，甚至向黨寫什麼“絕對沒有此等情事”的“保證書”。最後，當黨組織派人到當地調查證明檢舉的情節完全屬實之後，齊建民仍不承認。於是，中共北京市建築工程局器材供應公司總支委員會就決定把這個企圖對黨欺騙到底的人清洗出去；以後在報請上級黨委批准的過程中，由於齊建民認識了錯誤，作了檢討，並且懇切地要求留在黨內；最後，上級黨委才決定給予他留黨察看兩年的處分。

有人以為對黨隱瞞和欺騙當然是不對的，但如果是對革命有過汗馬功勞的老黨員、老幹部在個別歷史政治問題上有過隱瞞，一旦被發現，黨也應該從寬處理吧。這種想法更是錯誤的和危險的。應該提醒這些擔任了黨和國家的比較負責職務的老黨員和老幹部，首先要懂得，黨內沒有兩種紀律，只有一種紀律，違反了這種紀律，就沒有什麼容忍、原諒、照顧和妥

協的餘地。不管資格多老，職位多高，紀律是不能徇私的。黨的紀律所以是鐵的紀律也表現在這裏。其次要懂得，既然是老黨員、老幹部，既然是黨和國家的負責工作人員，更不能對黨和國家有絲毫的隱瞞和欺騙，更應該成爲忠於黨和國家的榜樣。共產黨員、前華東軍政委員會水利部副部長劉寵光由於長期隱瞞政治問題被開除出黨就是一例。劉寵光是一九二七年加入共產黨的黨員，一九三二年被捕，在被捕後的頭兩年中，鬥爭堅決，表現很好，以後在敵人的刑訊逼供威脅之下開始動搖，終於承認了自己是共產黨員，並寫了“自白文”。同時，獄中壞分子用劉的名字擬了反共宣言，要劉簽字發表，劉雖未簽字，亦未反對，直到這一宣言在報上刊出，劉仍未表示抗議。出獄之後，他一直隱瞞着這些叛黨變節的真實情況，於是在一九三七年又重新被接收入黨，以後，黨曾幾度對他的歷史進行審查，如果他能痛切地認識自己的錯誤，並且向黨坦白地交代這種錯誤，黨對他當然還會從寬處理的。但是他却始終不作忠誠老實的交代，直到一九五二年的整黨運動中，才查清了他的這段歷史。黨並沒有因爲他是老的共產黨員和高級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而容忍他和照顧他，還是對他執行了黨的最高的紀律處分，把他開除出黨了。

對共產黨員、青年團員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進行政治上忠誠老實的教育，提倡說真話，反對說假話，是各級黨組織、團組織和國家機關的一項經常的重要任務。在目前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鬥爭中，這種教育就顯得特別迫切和重要。在歷史政治問題上有隱瞞欺騙的人，把自己的歷史政治問題

徹底交代清楚，就等於同反革命分子劃清了界線，使組織和羣衆認清自己，就便於孤立和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能夠使得自己卸下包袱，更積極地投入同反革命分子的鬥爭，更有成效地為黨為國家工作。

我們必須向一切隱瞞了歷史政治問題的人指出：政治上的隱瞞是遲早要被揭穿的。因為任何偽造的歷史和情節都是經不住檢查的，任何政治上的反動行為都是有人會知道的。隨着黨和國家的嚴格審查，隨着羣衆覺悟的不斷提高，隨着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揭露和肅清，一切在政治上的謊言和欺騙都將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究竟是自動交代出來好呢？還是被檢舉出來好呢？究竟是徹底交代好呢？還是交代一部分隱瞞一部分，而最後隱瞞的部分被揭發出來好呢？對於反革命分子，我們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贖罪、立大功者受獎。對於隱瞞了歷史政治問題的人，我們的政策是：坦白從寬、隱瞞從嚴、千方百計進行欺騙者加重處理。反革命分子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還會受到寬大處理，有一般歷史政治問題的人坦白交代自己的歷史政治問題，當然更會受到寬大處理。一切隱瞞了自己的歷史政治問題的人，應該勇敢坦白，立即用忠誠老實的態度來洗雪自己隱瞞欺騙的過錯！

(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

革命幹部必須對組織忠誠老實

王 璞

了解幹部，是黨組織和國家機關正確執行幹部政策的重要環節。讓組織了解，則是每一個幹部嚴肅的政治責任。

幹部無保留地將自己一切情形告訴了組織，才便於組織對幹部全面地、透徹地了解，才能正確地培養和使用，才能像園丁栽培心愛的果樹一樣，幫助幹部克服缺點，不斷地上進。

列寧在“進一步，退兩步”一書中曾指出，無產者在他還是孤立的個體時，是沒有什麼力量的，他自己的全部力量，他自己走向進步的全部能力，他自己的一切希望和願望，都是從組織中，從與同志們的有計劃地共同活動中汲取的；當他是偉大而強有力的機體的一部分時，他就覺得自己是偉大而強有力的，對於他，這個機體就是一切。這就告訴我們，一個革命幹部要想把自己鍛鍊和提高到無產階級先進戰士的水平，就應當在實踐中使個人和組織溶為一體。如果一個人在政治上、歷史上還有什麼事情不肯告訴組織，那就表示個人和組織之間還有距離，他就不可能和組織、也就是和集體完全溶合起來，他也就不可能從組織和集體汲取走向進步的全部力量。

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上指出，我們選拔幹部的基本標準，第一條就是對工人階級事業、對黨抱無限忠

心。如果一個人連歷史上的錯誤和污點都要當作“珍寶”一樣，深深地向組織隱藏起來，那末，當爲了革命事業、爲了保衛祖國，需要他貢獻出自己的一切的時候，我們怎麼能預斷他不會吝惜、不會畏縮呢？

對組織是不是忠誠老實，是識別一個幹部的政治品質是否優良、思想覺悟是否高和革命立場是否堅定的根本標誌之一。

應當指出，絕大多數幹部能够將自己的全部歷史、全部工作的真實情況無保留地告訴組織；但也有些幹部對組織採取了不老實的態度。他們把自己的歷史、家庭和社會關係中不光彩的部分掩蓋起來，誇大進步和有功的方面，或虛構事蹟，抬高自己；個別僞造歷史、甚至用假冒的辦法在革命隊伍裏進行蒙混的例子也是有過的。這些欺騙隱瞞的行爲，無例外地都會對革命對自己產生有害的後果。

有一個同志，向組織填寫履歷的時候，隱瞞了兩歲年齡，虛報了大學肄業的學歷。當初他只是覺得這樣才可以使別人瞧得起，將來找愛人也方便些。但是當組織要解決他的黨籍問題而認真對他進行審查的時候，就發現了他的歷史前後對不起頭來。以後本人交代清楚了，可是事情已經遲延了兩年多。他異常懊悔；當然，這兩年可貴的時光，是用多少懊悔也無法挽回的。

抗日戰爭時期，有一個女同志，在家經父母做主嫁給一個國民黨特務頭子，因爲常受虐待，“逃婚”跑到陝甘寧邊區。又怕“丈夫”到邊區來捉她，她按照一個已經死去的同學的出身

和經歷，假造了自己的姓名、籍貫和全部歷史，隱姓埋名參加了革命。這個同志過去的遭遇是不幸的，對惡勢力也有反抗的勇氣；其錯誤在於接受了革命思想、入了黨、已經懂得了“丈夫”不可能到邊區來捉她之後，仍然沒有向組織更正自己的歷史。後來在反動派派遣大批特務破壞邊區，因而反奸肅特鬥爭異常緊張的時候，組織發現了她與國民黨特務頭子有過關係以及偽造全部歷史的離奇情節，特別是本人一直隱瞞，便停止她的黨籍進行審查。最後本人交代了，問題也弄清楚了；但是幾年來精神負擔異常沉重，工作、學習和健康都受到很大影響。

毛澤東同志經常教導我們：作什麼事情都要老老實實，一切不老實的人總是要吃虧的。這兩個同志就吃了不老實的苦頭。

不僅如此，幹部在歷史政治問題上對組織不忠誠，而且會嚴重地影響革命隊伍在組織上和政治上的鞏固。“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警告我們：“在一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發展引起了帝國主義首先是美帝國主義的極大的仇視；美帝國主義正在繼續侵佔我國的領土台灣，並積極利用台灣和其他軍事基地對我國進行顛覆活動和準備侵略戰爭。在另一方面，國內的反革命殘餘分子和資產階級中堅決反對社會主義改造的反動分子，隨着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進展，也正在加緊他們的反革命復辟的陰謀。”敵人為了實現他們顛覆活動和反革命復辟的陰謀，一定要千方百計地尋找和利用我們內部不堅定、

不忠實的分子，來進行對我們內部的腐蝕、瓦解和破壞。幹部對組織隱瞞了重大的歷史政治問題，敵人就正好抓住你這條“不可告人”的辮子，來威脅你、引誘你，最後可能完全把你拖下反革命的泥坑。這從來就是敵人在特務活動中慣用的伎倆。抗戰初期，有一個青年，因愛國抗日心切，被國民黨用“游擊戰爭訓練班”的假招牌騙到戴笠的特務訓練班，被迫受了兩個月的反共特務訓練，畢業後借故逃脫，經過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的關係，到抗日根據地參加了工作，自以為從此脫離火坑，重見天日。但對於受特務訓練一段歷史感到嚴重，不敢講，認為只要自己真心革命就是了。沒有想到後來訓練班的另一個特務奉命又來找他，說不反對他為革命工作，但也得給他們服務；要拒絕，就公布他在特務訓練班受訓的證件，使他受到共產黨的制裁。由於怯懦和缺乏政治經驗，這個青年就背離了革命，在特務的控制下為反革命服了務。這類例子可以找到很多。從最近揭露的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中，也不是可以看到有些有歷史政治問題又不向組織交代的人，已經被他們拉下水、或者已經成為他們“爭取”和“聯絡”的對象了嗎？過去還有許多事實證明，不肯把自己的活動向組織公開的人，不是往往被反革命或野心家所利用，成了他們的工具或無意中包庇了這些反革命或野心家嗎？這些必須引起我們的警惕。隱瞞歷史政治問題的人，只有向組織坦白交代，才能爭取組織的幫助，堵塞自己這個可能被敵人所乘的漏洞。

欺騙隱瞞、偽造歷史，這是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活動

手法。如果一個革命幹部也對組織欺騙隱瞞、偽造歷史，那便影響了革命隊伍中的互相了解、互相信任，便模糊了人民的眼睛，增加了辨別反革命分子的困難。誠如羅瑞卿同志在“提高警惕，反對麻痹”一文中所說：“大家都不說假話，那末，靠說假話來欺騙革命組織、欺騙人民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孤立起來，他們的活動和生存就會發生更大的困難。這樣就一定會大大有利於我們同反革命分子的鬥爭。”

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要偽造歷史的。可是為什麼有些革命幹部也會有這些隱瞞欺騙的行為呢？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大部分都是非無產階級出身，雖然參加了革命工作，但在沒有得到徹底改造以前，還帶着許多個人打算：名譽地位觀念、向上爬、愛面子、投機取巧、患得患失等，這些思想使他們不能很好地用科學的、老老實實的態度對待問題。另一方面，虛偽和欺騙，是歷史上一切剝削階級、尤其是資產階級所具有的性格。資產階級如果不用謊話和欺騙，就不能在競爭中擠垮別人，也不能維持他的剝削。他們把老實說成“無用”和“傻瓜”，把奸詐稱為“機智”，把正直當作“愚蠢”，隱惡揚善被奉為“美德”。因為資產階級還沒有被消滅，他們這種腐朽的思想意識和道德觀念就會影響在革命隊伍裏的那些思想不健康的幹部。這便是欺騙隱瞞行為的社會根源。

一個人，從反動勢力統治的、充滿罪惡和污濁的舊社會裏出來，如果歷史上弄得不大乾淨，這是不奇怪的。我們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認識問題，就不該把這些事情對組織隱瞞起來。今天參加了革命工作，要求進步，痛恨自己歷史上的錯

誤，這是好現象；既然如此，就更不該把這些事情隱瞞起來。因為一個人的進步和改造是不能割斷歷史的，必須正視自己的歷史，揭發和批判歷史上醜惡和錯誤的東西，才能樹立新的東西，才能真正從思想上、政治上提高自己，向前進步。即使過去有過反人民的罪行，也只有坦白交代，才可以減輕自己的罪過，才可以立功贖罪、重新作人。

對組織欺騙隱瞞，和一個革命者的道德品質是不相容的。我們革命的最終的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共產主義要消滅階級，解放全人類，建立一個無限美好的、充滿着光明和幸福的新社會，這在人類歷史上是空前艱巨、空前偉大的事業。所以一個真正建立了共產主義世界觀、願意為這一事業而奮鬥的人，他就應當有偉大的胸懷與氣魄，能擺脫一切個人顧慮，而成為一個高尚的人；他也就應當光明磊落，無事不可對黨言。因為他隨時都準備為革命事業犧牲一切，自然就不怕揭露和改正自己一切不利於革命事業的錯誤。他能把革命的利益當作自己的利益，把自己的利益溶合於革命利益之中，所以他也不會產生任何需要用欺騙組織的方法去達到的自私自利的目的。

如果一個人在思想覺悟不高的時候，有些問題沒有告訴組織，或說了假話，當受了革命教育以後，就要知錯改錯，坦白更正。這樣做會受到組織和同志們的歡迎。如果打算“一不做，二不休”，堅決隱瞞到底，這不但給自己關閉了進步和改造之路，而且事實是瞞不住的，自己也終於要受到歷史的懲罰。幾十年來，無數先烈為了革命事業獻出了他們寶貴的生命；我

們作為他們的後繼者，難道歷史政治上有些錯誤和污點還捨不得拋棄嗎？對組織隱瞞了歷史政治問題的，應當毫不遲疑地立即交代。

（“學習”一九五五年第九期）

放下包袱，說老實話

馬鐵丁

“中國青年”社轉來讀者胡存新的來信。

就胡存新在來信中所談的事實來看，他曾經受了反革命分子的利用，做過一些對不起革命、對不起國家、對不起人民的事情。最近在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運動中，他想坦白，但是不敢坦白。顧前顧後，畏首畏尾。說他內心矛盾重重，思想包袱很重，大約是不算過分的。

他的思想包袱歸納起來，無非是：要坦白早該坦白，現在已經晚了；怕講了組織上一股勁兒追問，以致越講越講不清楚，反而對自己更加懷疑；“我不講，他們也絕不會講的”，組織決不會知道；怕入不了黨、失掉了愛人、別人看不起，也就是我們所常常聽到的一句話，“沒有前途了”。

筆者擬就這種種思想包袱，作一些分析，並談談我自己的看法。

“時間已經晚了”。的確，時間確實失去了一些。參加革命、特別是入團的時候就該講，這對其他所有的同志，特別是將要參加組織而還沒有加入組織的同志是一個深刻的教訓：對黨對團應該講清自己的一切，絕對不能有任何隱瞞。你是真心愛護黨、愛護團，願意和組織站在一起嗎？如果是的話，那

末，對黨對團坦白忠誠就是真心愛護的起碼要求！

“三反”“五反”的時候就該講，這次運動一開始就該講，就是沒有什麼運動也可以講，然而胡存新沒有講。天天有機會等着你，你却一錯再錯，錯過了數不清的機會。從這一點上說，你犯了受反革命分子利用的錯誤，又加上了苟且因循長期隱瞞的錯誤。但是，話又要說回來，古語有云：“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現在就講，馬上就坦白，還來得及。比起別人檢舉，比起明天、後天講，甚至再拖下去，畢竟是好得多的。今天比昨天、比過去、比一開始加入革命隊伍就坦白固然是遲了；比明天、後天特別是比別人檢舉出來後才講總還是早的。

你在思想上怕“時間晚了”，又自覺不自覺地一天天拖下去，那豈不是時間越來越晚嗎？由於苟且因循，已經失去了一些時間，難道還不足引以爲訓，就此當機立斷嗎？既然“時不我待”，那不是更應該從速把問題講個明白，交代清楚嗎？

“怕組織上一股勁兒追問，越講越講不清楚”。共產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最科學的學說，從來就是主張實事求是的，從來就主張有一分說一分，有兩分說兩分。多的講少，那不行；少的講多，也不必要。

確實有這樣的人：他們開始不肯講，講了又避重就輕。非到組織上拿出真憑實據來給他看時，他死不認賬。對於這樣的人，我們是決不會受他們蒙蔽，輕易相信他們的。其實，即使他們的錯誤極大、罪惡極重，只要他們完全坦白，那末“坦白從寬”的政策對他們是同樣適用的。如果他們企圖抵賴，那是

抵賴不過的；企圖逃避，也是逃避不了的。

而對另一種人，尤其是像胡存新在信中所提到的那樣，他參加反革命活動爲時很短，而且很早就和反革命分子斷絕了聯繫，如果他確實把問題全部坦白了，組織上決不會再要他坦白他所不知道、所沒有參加過的事情。

現在除台灣外全國已經統一，交通又是如此方便，我們有充分的條件和可能去進行調查研究工作。特別是我們有黨的領導，有全國人民作爲我們的耳目，這就使我們已經掌握了和還在繼續不斷地掌握着極爲豐富的材料，我們完全可以根據充分的事實來判明各類有問題的人——他們的罪惡的輕重，錯誤的大小。

那些偶一失足的人可以用不着擔心把他們的小錯誤“追”成大錯誤，小罪過“追”成大罪過，他們所沒有做過的事情一定要他們承認。我們審查一個人是根據他的事實，而不是根據他的不合事實的胡言亂語！

“我不講，他們也絕不會講的，組織上決不會知道”。老實說：這完全是一種自欺欺人的想法。可不是？在胡存新的來信中，已經自己首先打了一個問號，覺得這種想法把握不大。莫說你所做的事是一夥人，還加入了一個什麼反動組織，很難保證其他人不坦白；就是你所做的事是一個人，所謂“單線聯繫”，也決不是可以長期隱瞞得了的。你既然參加反動活動，就會留下“活動”痕跡，你既有反革命聯繩，管你是雙線還是單線，聯繩總是有的。有活動、有聯繩，在衆目所視、衆手所指之下，決然逃不出人民的天羅地網。你用什麼來推斷別人